

周易繫辭上傳第五

朱熹本義

论纲

中国文化史



周思源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史论纲/周思源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550-0403-5

I. 中… II. ①周… III. ①文化史—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5952 号

中国文化史论纲

周思源 著

责任编辑 谢 曦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108

厂 址 福州市闽侯永丰村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27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403-5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前言

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既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伟大文明，也经历了几乎被列强瓜分，国人前仆后继、勇赴国难、可歌可泣的百年沧桑。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的三个都中断了，唯独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可见它一定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究竟是哪些因素在起支柱作用？

第二，创造过无数辉煌如此伟大的中华文明，怎么会在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衰落到几乎被列强瓜分亡国的地步？我们的文明中究竟存在哪些严重的先天不足与后天不调？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人数过亿具有大学文化的各界人士，以及几千万正在高等院校读书的年轻人，都应当从文化史角度对这些问题有清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大起大落，“文革”结束后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持续高速发展的康庄大道。怎样从文化学角度来认识这些历史现象、研究它的内在规律，成为中国文化人思考的热点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随着文化反思高潮的涌现，中国文化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高等院校尤为突出。因此，尽管它在学科归属上算作史学的一个专题史分支，但作为一门从总体上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文课程，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的，并立即受到许多高校的重视，成为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课或选修课。

1924 年至 1949 年有十几部《中国文化史》出版，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却没有再出一部。尽管许多高校一直设有文、史、哲等众多独立专业，但“文化大革命”前却还没有“中国文化史”这种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特点的课程。粉碎“四人帮”后 30 多年来出版的几十种《中国文化史》中，一类是横向板块式结构（板块内部则纵向叙述），包括古代礼制、法制、官制、兵制、学校、科举考试、赋役与货币、度量衡、岁时历法、兵器发展、婚姻制度、丧葬制度、民间神鬼信仰、禁忌习俗、重要节日以及地理与行政区划沿革等几十个专题，有些长达十卷、四五百万字之多。这类著作材料丰富，对本专题叙述详尽，历史感强。其中谭家健主编的《中国文化史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和阴法鲁、许树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三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印刷多次，影响最大，我本人也受益良多。另一类以时间（朝代）为线索纵向编写，突出某一时期的主要文化现

象与问题。这两类都是古代文化史，不涉及现代。我深感无论是大学生、研究生还是广大读者，都需要一部篇幅不很大却能够简明扼要地介绍五千年中国文化基本面貌、主要特征、裂变过程、发展趋势的文化史专著。

因此我决定将这部书的重点不放在各种具体文化知识的介绍上，而是以时代为线索，古今结合，史论结合，以史炼论，以论问史，以古鉴今，希望有助于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每章着重论述相应时代最主要的几个问题，着重介绍中国文化是在怎样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面貌；中华文化最核心的成分有哪些，基本特征是什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有何特点；中国各历史阶段在文化上的主要贡献或失误是什么，从而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几次重要裂变；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使中国人形成了哪些重要的民族文化心理；中国文化的辉煌是哪些主要文化基因在起作用；中国文化从哪里开始衰落，哪些落后文化基因导致了局部文化癌变；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几代志士仁人的曲折斗争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多次大起大落，从文化史角度来看究竟是什么原因；20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成分有几种，在不同时期分别处于什么地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文化史角度而言是处理好了什么关系；从中国文化史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来看，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其走向将取决于哪些因素，采取什么发展战略；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将扮演什么角色，中国应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西方应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总之，本书想要着重探讨的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发展脉络、几次重大裂变以及文化传统如何重整与新世纪的文化战略。

不过本书的重点仍然是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阐述文化传统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指什么，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多数学者认为指截止到19世纪末以前或到辛亥革命的古代文化，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本书取前者。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有联系却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文化”和“传统”分别作为中心词和定语时所表示的意思不一样。

“传统文化”是指经过世代传承下来具有明确内容和形式的文化，如文学、史学、哲学、绘画、戏曲、医术、武术、建筑、工艺品等。它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鲜明的物质性。它总是体现为某种典籍、技艺或实物。二是形态的特殊性。各种传统文化一般都有自己的特殊形态，不大会和别的混淆，只有早期某些典籍包含着文、史、哲多方面的内容，但是文、史、哲三种不同的学科成分还是易于区分的。三是由于这些文化的物质性和形态的特殊性，因此具有易把握性。四是不轻易改变性。有些传统文化形态如文化典籍可以有不同阐释，可以删节却不能增加；有些如戏曲可以适当改革，但其根本性的成分则不能舍弃，否则就不是

它了。

“文化传统”是指由于文化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形成的某种比较固定的精神、观念，因此它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而精神性的东西一般就不具有直接的可感性，必须通过某个具体文化事物、事件、现象才能体现出来。它也不像一幅画、一座建筑那样容易准确把握，而会出现阐释的模糊性和多样性。还有，同一种文化传统可以表现在不同的传统文化上，即具有泛物质性。这些是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由于时间的推移，新文化不断出现，从而会改变原有文化的构成。如果大量新质、新构文化涌入，那么文化传统就会出现裂变，包括断裂、充实、消退、更新。总之，文化传统总是继续不断地在向前延伸，而传统文化则是已经积淀了一段时期不再轻易改变的，即使发现了新材料，也只属于那个时代，而不属于后来时代。

因此本书着重介绍这些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裂变、重整的，重点不仅在于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古代文化是什么样的、对文化传统有些什么影响，还在于阐述中国现代文化是怎样的，在哪些方面扬弃了古代文化、在哪些方面吸收了新的养分，从而使整个中国文化和文化传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1 世纪的中国应当如何继续前进，如何面对世界，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能否正确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以及它们在中国历史与现实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态度，对异质文化尤其是西方主流文化的态度，都有了重大改变，中国文化的构成和走向和以前已大不一样。中国目前在继续改革开放中所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不同程度地有着包括观念、制度、传统、习惯等文化方面深层次的原因。从文化上进行剖析，更容易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改革开放后国人开始惊讶外部世界原来和我们被告知的很不一样。但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历史文化层面中去，这样就不能充分地科学认识中国文化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由于我们的文化太古老、丰富和复杂，很长时间里受到的干扰太严重，因此我们离真正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还有不小的距离。伟大的军事家与思想家孙武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可见，孙武认为，“知己”和“知彼”二者中，“知己”更为重要。因为当“己”处于对“彼”的优势时，即使不“知彼”也能战而“不殆”；若“己”不占优势而能有自知之明，也还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可能，至少可以避其锋芒，减少损失。但若不“知己”，那么“殆”就几乎必然。本书正是从“正确认识自己”的角度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和论证中国文化传统的裂变与重整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并探讨它在新世纪的科学走向。

世界究竟应当如何对待中国、世界能从中国得到什么、中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关键就在于外国能否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和三十年多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热情，而这种热情背后的动因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很长时期里，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主要是出于对一种古老异文化的兴趣，甚至将它看作古董或活化石。对外国人来说，中国文化（主要是传统文化）基本上只是一种审美对象，无论是觉得伟大、落后、神秘或有趣，都十分遥远，不会成为引起利害冲突的功利对象。因此新中国成立前，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人专门来华学习汉语，在国外学习汉语者也只是极个别国家中的极个别。即使像日本这样自以为很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其实也所知甚少。有些学者可能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研究得很深入，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和真正的优缺点，尤其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裂变与重整，基本上不明白。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一些改变，外国人忽然发现，新中国和自己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距离变得近了，中国不再是客厅里的摆设，而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巨大存在。外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发现他们原来很不了解中国，于是开始超越审美的界限，纷纷到大陆、香港和台湾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但要真正了解中国悠久而丰富的文化，决非一夕之功。对于长期怀着“欧美中心”观念的某些国家来说，偏见使他们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文化，尤其是他们忽略了中国文化传统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依旧用老眼光来看待，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中国。

外国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大大加强。如果说20世纪初期关心中国文化的主要是个别国家的个别汉学家与收藏家的事，到了50—60年代主要是政治家和极少数学者的事，那么到了70年代末以后不仅政治家和学者队伍扩大了，而且许多普通人，尤其是商人和旅行者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不少外国人都感到，许多地区的甚至全球性事情都必须有中国参加才能或才容易解决。中国不再遥远，就在身边，中国与自己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一些国家的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有的甚至将汉语列为第二外语。人们希望从文化层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起飞的动力与发展趋势，并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未来走向作出正确预测。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成分、特殊品格与历史流变，衡估中国文化的历史功过，正确评价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不仅是中国人21世纪走向世界的心理基础，也是外国人在新世纪与中国打交道的认识前提。

人类不同民族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同的文化心理，比如都孝敬父母、热爱故乡、珍惜和平、反对压迫等等。正是由于众多的共同之处，所以相距遥远的人们也不难沟通。但是不同民族由于长期以来生存条件、发展过程形成的生存方式，

造成了大不相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我们要从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生存方式入手，才能弄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心理。比如，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对猪都有极大的好感。肥猪是年画和农民画的重要题材，代表着丰收和富裕。汉字“家”是宝盖头下面一个“豕”字，意为在房舍中养着猪，或者说屋子里养着猪的才算是“家”。可见猪在构成社会基本单位“家”中的重要地位。故猪在中国历来被尊为六畜之首，位在牛、羊、马、鸡、狗之前。因为在中国文化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和其他牲畜相比，猪更容易饲养，其育成期短、繁殖率高、肉味鲜美，不但是华夏先民肉食的主要来源，也是脂肪的重要供给者，很脏的猪粪还是农业量大质优的肥料。因而猪在华夏大地农业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耕作主要劳力的牛只得屈居第二。产量也很高的羊和在战争与运输中作用巨大的马则位居第三和第四，因为它们主要产于古代中国的北方和西部，那里不是古代华夏民族的主要活动地区。而在伊斯兰文化中，猪乃不洁之物，为人们所极度厌恶，远远没有牛羊来得重要。这是由于伊斯兰文明是在游牧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牛羊可以放牧，而猪只能圈养，所以游牧民族不可能养猪。而且猪比较脏，在水源缺乏的草原地带难以保洁，而在水源丰沛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很容易蓄养得比较干净。对牛羊和猪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特征。而这种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自古以来的地理、历史条件逐渐形成的。因此弄清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正确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前提。正是这些文化形成的特殊条件，才使得中国人在不少问题上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

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而地球村住户们之间爆发冲突的危险某种程度上却在加大。在20世纪初期，横渡大西洋或太平洋都需要至少十几日的艰难航行，而仅仅只过了半个多世纪，耗时就缩短到了十几个甚至几个小时。一些当时还被认为是童话的幻想，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寻常事物。由于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在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彼此的依赖，也蕴含着利益冲突因素的大量增加。过去引发冲突的主要是领土与资源，后来增加了海洋，而现在太空领域、卫星的通讯频道等也都成了争夺的对象。高技术在取得战争胜利中的作用已越来越大。20世纪60—70年代还需要出动数十万大军进行历时几年伤亡数万官兵的战争，现在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胜负往往只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天，伤亡数百人就能决定。地球村使人们的距离大大缩短，却使战争的距离迅速扩大，“看不见的战线”已经由比喻成为真正的现实。“决胜于千里之外”已不再单纯是相对“运筹于帷幄之中”而言，已成为“克敌于千里之外”的同义语。因此加强地球村住户们之间，尤其是那些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之间的彼此沟通与理解，更为重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结底是文化复兴。现在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充满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素质高下之争。我们只有真正认识自己文化的强点与弱点，才能更加自觉地发扬文化优势、克服文化劣势，吸收世界上一切于我有用的积极文化因素，努力建设中国先进文化，从而将先进文化优势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强大动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让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永远成为历史，是几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心愿，也是当代全体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帮助中国人深入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帮助外国人初步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写作本书的目的。

本书初名《中国文化史论纲》，“史”就是要弄清文化发展脉络；“论”就是要有思想；“纲”就是简明扼要。因此这个定位先天地决定了对许多重要问题必须大胆取舍。“说清楚”是相对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则只能一带而过甚至舍弃。什么都想“说清楚”，涉及的问题必定很多，反而不易说清或不突出主要问题。我希望本书有针对性、当代性与前瞻性，成为有个性的专著。

周思源

2000年11月初稿，2014年6月改定于北京语言大学三间屋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文化”是一个发展的动态概念	1
一 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性质和“源”“流”“今”	2
二 外国人忽视中国文化传统的裂变与重整是造成外国与 中国严重冲突的重要原因	6
三 中国人也要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裂变与重整	9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	11
一 中国的相对封闭环境决定了文化的原生性	11
二 中国文化原生性最好的证明和最伟大的杰作是汉字	15
三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完整性	17
四 中国文化主体的强大变通能力和中国人的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心理	20
第三章 从黄帝至夏商周:上古时期就形成的中央观念与统一意识	27
一 四千多年前开始的统一史形成了中国人强烈的追求统一 心理	27
二 自古以来中国人心里只有一个“天下”	31
三 为统一中国做出贡献者受到尊敬,反之则遭到全国人民 唾骂	33
第四章 春秋战国:中国哲学与道德伦理的奠基时期	37
一 中国古代史上最重要的“中间”阶段	37
二 最可贵的是多元并存的时代精神	39
三 我们从孔子和孟子那里最需要继承的是什么	40
四 《老子》的辩证法和《庄子》的相对主义	49
五 《周易》与儒道的双向促进	54

第五章 秦汉：“书同文字”与“独尊儒术”两种“同”的两种后果	57
一 没有“书同文字”就不会有中华民族	57
二 从生动活泼到大一统的利弊	61
三 汉朝正确的民族政策与汉文化传播	66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民族与宗教显示的中华文明宽容性	71
一 大倒退：西晋分封导致王朝短命	71
二 民族融合的重要动力：少数民族主动以汉文化指导 王朝建设	74
三 中华文化儒道佛基本格局初步形成	82
第七章 隋唐：体制改革与开放观念带来的辉煌	87
一 从文化史角度认识短命的隋代	87
二 正确的民族政策带来了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个性	90
三 “书同文”后的又一伟大文化措施：建立科举制度	92
四 唐代文化的辉煌来自开放形成的多元性	95
第八章 宋元明：中华文明从巅峰开始跌落	101
一 商业繁荣，商人却没有地位	101
二 官方哲学阻遏了思想自由	105
三 中华文化的和平性	110
四 蒙元在辽金之后也融入了中华文化主流	112
五 明代：专制统治愈烈，思想进一步受到束缚	116
第九章 清：文化专制与奴性极度发展	125
一 中国疆域的最后确定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125
二 残酷的文字狱彻底扼杀民族精神	128
三 思想窒息使古代中国失去最后一次起飞机会	136
四 20 世纪中国的巨大变化充分证明康雍乾三朝的严重 失误	143
第十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转折	147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	147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注入了新的文化精神	153
三 五四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	162
四 坚持五四开创的新文化传统	164
第十一章 构建中国新的先进文化体系	167
一 儒家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主导思想	167
二 儒家思想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仍可发挥重要作用	172
三 深入发掘易学、道学和佛学中的积极因素	176
四 关键是处理好三种文化成分的关系	180
五 彻底清除封建专制意识，建立自我净化机制	185
附录一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188
一 中国人注重思维的浓缩性	188
二 崇虚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	193
三 注重整体性把握，从整体出发观照局部	196
四 注重辩证是中国人思维的宝贵特点	197
附录二 从孔子、老子、如来佛共处一室看中国人的宗教观	200
一 儒学不是儒教，但没有宗教能够取代	200
二 中国人对一切宗教历来采取宽容的态度	205
三 政教分离和宗教的世俗性	207
附录三 中国人办大事的心理与能力	211
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办大事的心理与能力	211
二 外国人对中国人办大事的心理与能力严重估计不足	214
三 中国人办大事的心理与能力能够化解许多弱点	215
附录四 中国文化与 21 世纪的世界	219
一 中国文化在 21 世纪的世界究竟会占什么地位	219
二 中国文化尚不具备成为世界主导文化的条件	222
三 冷静看待“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	227
四 正确估计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230
五 21 世纪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235
后 记	239

第一章 “中国文化”是一个发展的动态概念

“文化”的定义多达数百种，和“文明”有些不同。这里统一用“文化”来代表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由于“中国”的概念在古代有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的漫长过程，在远古没有此概念，有时候只好用“中华”表示，主要就是指现代中国大陆范围内的文化。之所以把“‘中国文化’是一个发展的动态概念”作为第一章，不仅是由本书“史论”的性质所决定，也因为国人及外国人常常忽视了中国文化在一百多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首先树立动态文化观，才能弄清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和当今文化的性质。

曾任美国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9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1]的著名论文，在此基础上1996年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在这两部（篇）论著中，亨廷顿实际上是将中国文化定性为“儒教文明”，并认为“儒教文明”和以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为主的伊斯兰文明最有可能联合起来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亨廷顿为自己的理论设置了一个错误前提，因此推导出来的结论自然就不可能正确。如果对中国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与文化稍作一些研究的话，就不难发现中华文化从“源”和“流”到“今”，性质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早就已经不是“儒教文明”，今后也不会再回到“儒教文明”的状态。

如果说20世纪最主要的国家关系存在于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话，那么21世纪最主要的国家关系将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2]亨廷顿教授在写于1997年12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也这样认为：“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 and 美国的领导人协调各自的利益，以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3]。这些年来，许多美国政要反复重申了这一观点，时间证明了这个判断的前瞻性。

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50年代在朝鲜进行的主要是美国与中国的战争、60年代初印度与中国以及60年代末前苏联和中国的边境战争，从某种层面来看的重要原因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

理。一些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士，总是错误地看待当时的中国，以为中国依然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之初那样，从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的决心，低估了中国的实际力量。因此他们总是不大重视中国的警告，以为只是虚张声势，于是一味进行冒险，扩大事态，直到事情不可收拾。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半个中国沦陷后抗战却依旧继续；对于所谓“台湾独立”和“西藏独立”，中国的态度如此毫无妥协的余地。其实只要对中国文化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就会明白中国人的某些文化观念和西方人很不一样。

因此，正确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外国与中国交往的前提。中国人正确了解自己的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也同样重要。任何一片树叶总有正面和反面，而且正像手心和手背一样不可分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具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也存在一些极具个性的严重缺点，先天不足，后天不调。我们过去所走的许多弯路和目前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文化上找到深层次的原因。只要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强点与弱点，就能扬长避短，避免以短为长，使我们前进的方向更加明确，步子迈得更大、更稳。

一 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性质和“源”“流”“今”

要了解一个国家，自然要认识其国情，中心问题便是正确认识这个国家文化的性质。如果对此作出错误判断，那么就会对诸如制定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带来不良后果。

“中国文化（文明）”既用来指迄今为止的一切中国文化，又常常指中国古代文化。它永远处于发展之中，是一个动态概念。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看中国文化，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最近一百五十年甚至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变化尤为深刻。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固然应知其“源”，也要了解这种文化之“流”，更要清醒地认识其“今”。对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只有从“源、流、今”的动态角度，才能清楚地认识改革面临的许多深层次的原因，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今”是“流”的一部分，似乎没有特别提出的必要。但是，由于中国历史悠久绵长，“流”的阶段长达两千余年，而最近一百多年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突出这个带有根本性变化的时期。不但要标出“今”，还要对“今”作进一步的阶段性划分。

对于外国人来说，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变化、认识中国文化成分的重组与彼此关系尤其重要。文化不仅仅表现为典籍与某些独特技艺，而且是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的体现。许多外国人比较喜欢研究或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文化，相对忽视对于近代（1840年起）、现代（1911年起）及当代（1949年起）和新时期（1978年起）中国文化的了解。有的人虽然注重研究中国的当代文化，

但由于不了解从“源”与“流”到“今”的变化过程，因此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当今的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以及与外国文化（包括前苏联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的关系，从而不了解中国国民性的深刻变化与强点、弱点。19世纪中期以来，与西方政权更迭频繁而体制基本不变、文化体系本质依旧所不同的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政治体制发生过多次具有本质意义的剧烈变动。

以孔子（前551—前479年）和比他时间略早的老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在学习、总结华夏大地上古文化典籍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形成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局面，影响后世数千年，这是中华文化之“源”。对任何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自然是维护其政权。在巩固政权使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得以扩大的前提下，让社会得到发展，从而使统治得以延续。儒家思想最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罢黜”不是消灭，“独尊”不是唯一，“绝其道”不是将其他学术思想赶尽杀绝，也不是不许它们继续发展，只是“勿使并进”，让儒家始终保持领头而已。儒家思想的地位从此特别突出，成为官方正统思想。而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也需要有自己的精神皈依，而倡导仁义、注重孝悌、主张忠恕、讲究诚信的儒家思想，能够帮助人们树立崇高的精神追求，实现家庭、社会人际关系和谐，因此两千多年来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精神源泉。

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也发生过一些大的变化，公元1世纪东汉初期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成分。经过几百年，佛教实现了中国化，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并没有破坏而是充实了原有的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改造了外来的佛教文化，使其为巩固自己的体制服务，并在改造对方中充实发展了自己。如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把主张三纲五常的孔孟之道和老庄虚无思想结合而成为“贵无”的玄学；宋代（960—1279年）儒家学者将先秦儒学、汉代公羊学、魏晋南北朝玄学与佛学结合在一起，阐释人的本性与命运的“义理”“性命”而风行于明代的宋明理学；宋明一些儒家学者又吸收了佛家思想，将理学发展为心学。大体上从6世纪末的隋唐时起，中国就基本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为两翼的古代文化体系。由于儒家的官方、正统与主干地位，将中国古代文化简称为“儒家文化（文明）”也未始不可。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这些变化，但它的基本性质和价值取向并没有改变。即它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维护封建专制社会稳定的作用始终如一，只是在儒家主体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损害的前提下有某种调整。佛教的传入虽然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但并没有对儒家思想造成取而代之的态势。即使在某些时期如8—9世纪的中唐，

韩愈等反对佛教，也只是看到它发展下去的危险，而不是它已经成为主体思想。佛教和道家思想之所以对儒家思想不能构成根本性威胁，主要是由于这三种思想体系的基本成分的差异造成的。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而“礼”的实质是遵从等级制度的规范，这对于巩固封建专制制度非常有利。同时儒家思想主张积极入世的态度，孔子本人就身体力行，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奔走呼号。这些都是封建统治者十分需要的，在当时和后世相当一段时期具有重大进步意义。而道家则对社会人生采取消极逃避态度；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认为“四大皆空”，期待来世，对现世的态度消极。这些都不利于社会发展，不像儒家思想那样容易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因此佛家和道家都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总的说来，直到19世纪后期儒家思想的价值吸引力除了个别思想家提出异议外，并未受到国人怀疑。尽管中国还有道家、佛家文化，但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文明）”，确实也还可以。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和中国的屡屡失败，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觉醒。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光靠中国固有文化，连国家独立、民族生存都难以维持，从而开始把拯救民族危亡的目光投向西方文化。尽管在几十年中，中国官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还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的层面上，而且一直坚持“中学（中国的传统学术）为体（根本体制），西学为用（应用）”（张之洞《劝学篇》），但“师夷”即向西方文化学习，却是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化结构的又一次巨大调整，其深刻性大大超过前者。这是因为佛教文化在经济基础、政治、伦理等基本问题上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根本冲突，而是自我改造并相互适应。而依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文化，政治上反专制的共和制，伦理道德上的自由、平等、民主，都和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严重冲突。因此具有鲜明异质异构的西方文化迅速地从根本上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并顽强地闯入这块禁地，从此渐渐成为中国文化传统新核心的一个重要成分。从19世纪后期起，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与文化传统在悄悄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变化，中国文化的“儒家”性质已经悄悄开始发生虽然缓慢却不可逆转的改变。从“源、流”到“今”的角度而言，这个长逾两千年的“流”尽管也有一些曲折，但从此开始酝酿着一个最大的转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

尽管1911年的辛亥革命历来被众多政治家与有些史学家认为是“失败”，至少是“很不彻底”，事实上一次革命本来就不可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但它毕竟推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使民主成为合法，为大量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提供了合法依据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昙花一现的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只不过是两场极为短暂的闹剧，恰好从反面证明辛亥革命的伟大。辛亥革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各种各样的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的胜利和

新中国的成立，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条件，中国文化传统的裂变与重整进程大大加快。因此从文化史角度看，辛亥革命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成分改造，实质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在很长时期内被严重低估了。

1919年前后酝酿与进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造成中国落后的旧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尽管这场运动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上有些过激，但是辛亥革命以前的“传统文化”阻碍中国发展的一面被揭露得相当彻底。“这种鲜明的批判意识来源于人性觉醒、人的价值观回归和主体意识‘我’的确立”^[4]，为从核心成分上引进新素质、改造旧素质奠定了观念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中国文化传统“流”的漫长阶段终于结束，根本性裂变正式开始，中国文化进入了“今”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新中国建立，使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系即马克思主义文化大举进入中国，成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建立新文化的灵魂。同时西方主流文化，即亨廷顿所说的“基督教文明”或“西方文明”，也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文化产生着或大（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或小（1949年后近30年）的影响。西方文化的这两个重要支系尽管在不同时期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大小不一，而且从意识形态与政治上来说彼此对立，但是都为新的中国文化所吸纳，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并进入传统而被继承。因此这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始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文化。胸怀博大的中国文化一直吸收着一切外来文化的优点，变得更加博大精深。如此看来，中国当今的文化格局，或者说当代中国文化，实际上包含着地位、作用、比重不一的三种成分：主体是以儒道佛为基本内容的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具有超官方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还有影响无所不在的西方主流文化。因此，当代中国文化绝不是“儒家”二字能够概括得了的，甚至并不占主导地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其地位一直不高，有不短的一段时间甚至处于被批判的位置。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尽管儒家思想受到了正确对待，但是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其已经或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何况传统文化中的其他成分尤其是道家思想和易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文革”的结束使中国人对古代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化、苏式文化、英美式西方文化都采取了重新审视的态度，并努力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当代新文化。从宪法、法律与理论和实际情况来说，居主导地位的依旧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不再是单纯的“儒家文明”早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在不断进行着深刻的裂变、重组、吐故纳新，通过反复扬弃，形成新的文化传统。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变化大于以往的四千年。所以要从古代、近现代（近代是古代与现代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和当代的不

同时期来看待中国文化。简言之，中国文化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以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在这之前的几千年是第一个阶段，即包括“源”与“流”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时期；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直到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和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至今也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在这百年中传统的中国文化经历了西方文化和苏式文化的反复猛烈冲击，形成了一些新的重要成分与特征。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文化随着整个社会一起进入了新时期，中国人对待古代文化、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认识的客观、平静和开放心态都是空前的。中国文化本身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程度前所未有的重新审视、吐故纳新、重新整合的较长（也许要一百年）的历史过程。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三种基本成分在文化整体中的比重一直在不断变化，某种成分占主导地位时，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就都向这个方向转变。认识这一点对外国人和中国人同样重要，而它恰恰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尤其是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由于概念混淆而常常发生误会。因为“文化传统”在 20 世纪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人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指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化，即“中国古代文化”。

总之，当代“中国文明”绝不是什么“儒家文明”，当代中国也根本不可能再回到“儒家文明”中去。相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具有全人类积极意义的精神财富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胸怀博大的中国文化所吸收。西方学者如果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20 世纪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这两大文明之间一直在不断靠拢，而不是互相排斥。

二 外国人忽视中国文化传统的裂变与重整是造成外国与中国严重冲突的重要原因

亨廷顿教授的论著突出了“文明的冲突”，而对书名的后半部分“世界秩序的重建”这个命题，并没有详细论证如何才能有效地“重建”和平的世界秩序。相反，却在“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的惊人结论下，“假设在 2010 年”“中国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于美国”，结果“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展开了一场反对中国、日本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真正的全球战争”。亨廷顿先生这种好莱坞式的预测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错误认识，而对异文明的错误理解往往导致冲突产生、扩大甚至失控。

20 世纪外国与中国的某些冲突，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从外国方面来说，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忽略了中国文化在 20 世纪已经发生了